



欧美社会保障丛书
OUMEI SHEHUI BAOZHANG CONGSHU

甫玉龙 主编

风险大转移

新经济无保障和美国梦的幻灭

修订版

[美] 雅各布·哈克 著
刘 杰 胡晓明 译
罗怀宇 朱晓苑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欧美社会保障丛书
OUMEI SHEHUI BAOZHANG CONGSHU

甫玉龙 主编

014037983

F171.2
60-2

风险大转移

新经济无保障和美国梦的幻灭

修订版

[美] 雅各布·哈克 著

刘杰 胡晓明 译

罗怀宇 朱晓苑

藏书
图书馆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北航

C17236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171.2
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大转移：新经济无保障和美国梦的幻灭 / (美) 哈克著，
刘杰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5161-3850-2

I. ①风… II. ①哈…②刘… III. ①经济—研究—美国
IV. ①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17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邢耀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父母

中文版序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 珍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的城镇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建立了企业—国家保障模式，即运行主体是用人单位（企业），而国家是最后的埋单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原来的企业—国家保障体制渐渐不能适应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旧体制、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需求日益强烈。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尝试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此时适逢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成主流。在社会保障领域新自由主义减少政府的干预、社会保障私有化等等。刚刚开放的中国人热切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理论和政策，由于最先向中国打开大门的是美国，所以当我们说向国外学习时，我们潜意识里想的就是学习美国，所以美国的理论和政策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影响是深刻的。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社会政策实施 30 年来，到底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我们知道得很少，由北京化工大学刘杰教授和她的同事们翻译的、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的《风险大转移：新经济无保障和美国梦的幻灭》（以下简称《风险大转移》），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看见新自由流行之后 30 年来，风险承担的责任如何从政府、企业向个人转移。政府、企业责任减少的代价是个人风险的增加。

讨论近 30 年的事，我们需要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说起。1929 年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经历了自由主义到干预主义，再由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2007 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券危机，并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危机波及全世界，终于在 2009 年爆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仍在痛苦地挣扎。此次危机引发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相信新的理论和政策正在酝酿中。

美国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信市场是有效的而政府则是无效的。1929 年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世界，形成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也动摇了美国人对市场的信仰。在美国，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到 1933 年失业工人达 1500 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1/3；1/6 的家庭靠救济金度日。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在大萧条中经受着巨大的痛苦。第一次经济大危机的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商品过剩，因而工厂倒闭、失业增加、收入减少、需求进一步下降，危机加深，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摆脱危机，重振美国经济，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罗斯福总统制定并实施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即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提高有效需求。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用来做两件事：一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带动就业，增加工人的收入，以增加有效需求；一是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并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福利开支救济，直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扩大有效需求。罗斯福新政的成果之一是 1935 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由此建立了包括老年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盲人救济金、老年人救济金、未成年人救济金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后，美国的社会保障法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些社会保障的项目、扩大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的水平。

1935年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政府的角度看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工具；从个人的角度看，政府为美国人建立起了经济风险的保护网。当人们年老退休、失业或因为其他原因陷入贫困时，可以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从社会保障实施的效果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缓解贫困、稳定社会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具有示范的意义，因为第一次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的对策也成为其他工业国的对策，各工业国纷纷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由此，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进入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一时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好评如潮，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也成为政府管理社会风险的工具。

事实上，凯恩斯主张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即根据经济情况变化，有意识地扩大或紧缩政府支出使财政起到反危机的作用。实行这种政策的具体办法是逆经济波动风向而采取扩张与紧缩政策：在经济衰退期，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甚至采取赤字财政和发行公债，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高涨期，政府则应实行紧缩政府开支和增税措施，以减少总需求，通过这种松紧搭配的补偿性财政政策，保证整个经济周期收支平衡。凯恩斯主义的逆经济周期管理财政支出的理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正确的，但是他忽视了政治和福利的刚性。经济周期是双向的，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一旦建立，由此引发的公共开支的增长几乎是单向的，只有上涨再上涨。在民主体制下，每几年一次大选，许诺更多的社会开支是创造选票的机器，候选人必然开动这个机器，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周期”。其次，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建立，来自各方的社会力量也会推动其开支的上涨，即所谓福利的刚性，福利只能增不能减，福利增加皆大欢喜，福利减少则遭抵抗。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两次大幅度上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瓦解，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而通货膨胀则居高不

下，出现了所谓“滞胀”。曾经使福利国家为之骄傲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于它的经济增长来说已是太昂贵的东西了，它已成为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甚至是相当沉重的负担。^①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意味着政府也会失灵，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主流地位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在讨论“滞胀”的原因时，新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鼓励扩大开支、鼓励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张，其结果是税收的增加，而税收的增加又导致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减少，所以经济停滞不前；同时供给不足则一定产生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批评凯恩斯主义、批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减少公共开支、减少社会保障开支，从而降低税收，以鼓励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的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经济因素外，20 世纪 70 年代，高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老龄化则意味着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开支刚性增加，对财政构成压力。尤其是人们意识到，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 21 世纪初将进入退休年龄，21 世纪初将面临退休金支付和医疗费用支付的巨大压力，因而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也是自由主义实践的先行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里根总统在社会领域进行改革，正像《风险大转移》中描述的是对原来风险共担的机制进行改革，将风险由政府、企业向个人转移，从而减轻政府的责任或者企业的责任。正如《风险大转移》的作者指出的，美国人崇尚自由，一贯对政府抱有警惕性，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在高收入国家是比较少的。在高收入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花费最高的两项制度，一项是社会养老保险，一项是社会医疗保险。而在美国，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退休收入仅能替代工作收入的 40% 左右，在 OECD 国家中仅高于日本，比其他所有的国家都要低，所以企业提供的年金制度对老年人

^① 李珍：《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6 页。

很重要，大约有一半的退休人口可以从企业年金获得退休收入，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企业年金一般为待遇确定型（DB 计划），即企业承诺雇员达到一定条件时，按一定的公式计算并发放年金。除了瑞士，高收入国家只有美国没有针对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只为 65 岁以上的人口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其他的人口则依赖商业保险。虽然政府不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但政府鼓励企业为雇员及其家庭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来分散医疗费用风险。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障的提供方面已经是一个小政府，社会保障私有化无从做起，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国将企业年金从待遇确定型计划改为个人账户（供款确定型，DC 计划），这样，企业的风险就转移到个人身上；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为雇员及其家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而是鼓励雇员及其家人通过医疗储蓄账户来解决医疗费用风险。我们知道，风险的分散是要基于大数法则的，个人账户在应付巨额医疗风险时一定是有局限的，个人的风险因此陡增。加上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波动更大、就业和收入不稳定、政府对社会救助等社会项目支出的削减，所有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使得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民众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风险。与此同时，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而增大的蛋糕却被极少的人占有其中的绝大部分。初次分配的失调，而再分配的作用又被削弱，结果是美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人越来越脆弱。这就是《风险大转移》描述的近 30 年内美国发生的事情。

在过去的 30 年里，国内的文献关注较多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介绍美国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文献很多，而很少有人关注这些政策对民众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来说，近年来大量的文献介绍 401(k) 计划的发展，兴奋地计算 401(k) 计划有多少资产，却不知道 401(k) 计划的本质是将企业从退休金支付的风险中解放出来，而将个人置于风险的中心。《风险大转移》给我们补了一课，作者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用大量的数据和许多生动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本质上是将经济风险从政府或者企业

的身上转移到个人身上，许多人因为养老金不足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许多人因为没有保险而不得不举债看病。

掩卷思索，我有几点体会与读者分享。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保障供给的过度和不足都是不足取的。20 世纪 50—60 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支出的持续大幅上涨，超越了经济的负担能力，是最终构成“滞胀”的原因之一；21 世纪初的南欧诸国重蹈覆辙，这些都是社会保障开支过度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时，《风险大转移》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下，个人面临各种经济风险，社会保障供给的不足，将政府的责任推卸给个人，个人暴露于风险之下，家庭和个人的脆弱性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教训。

在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要只看它的理论是什么，还要看它的政策是什么，更要看它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施某项政策以及政策的效果是什么。有些国家是只说不做，有些国家做了，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我们要分析中国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我们可以学什么，不学什么，尽量避免走弯路。举一个我们在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食洋不化的例子。

前面提到过，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在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减少对公立医院的支出，将医院推向市场，结果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突出。在医疗保障领域，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消失，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在“效率优先”的理念下，将就业人口的家庭成员屏蔽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造成城镇居民（除职工外）在长达 20 余年的时间内没有医疗保障制度的保护，因病致贫问题严重，引发社会深度焦虑。为了体现效率，中国还在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中建立了个人储蓄账户，一方面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保障，另一方面却是他们个人账户中的保险费不能发挥保险的作用，同时又有大量的资金沉淀。效率损失可见一斑。

希望我们在阅读了《风险大转移》以后，能够得到一些启发：他国的公共政策效果如何？我们能学吗？

《风险大转移》的作者和我有一个共识，即在风险管理领域个人主义是不适用的。201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的《社会养老保险私有化的反思》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个人的风险之所以得以分散，是因为大数法则在发挥作用。当商业保险不愿或者不能够提供某种保险时，政府的供给是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但当新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流行并取得成功时，人们很容易忘记了风险管理领域的特殊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守住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责任边界是同样重要的。政府的责任边界只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而不是当万能的保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李珍博士

2013年元月

修订版序言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家庭的经济危机已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06年春，我刚刚写完这本书时，这个问题还无人提及。然而，政府的缄默不语和人们私下的纷纷议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反差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在美国人牢骚满腹时，却仍有许多时事评论员认为美国人应该感到欣慰？为什么政治领袖很少谈及经济公平性？为什么美国中产阶级会如此没有安全感？怎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焦虑？我意识到，经济危机已悄然潜入劳动者的家庭生活中，但我却不知道这个泡沫会在何时破灭。

200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积压在民众心底的对美国经济的不满暴露无遗。选票结果表明，80%以上的选民都认为经济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的，远远胜过他们对恐怖主义、贿赂丑闻，甚至对伊拉克战争的关注。其中，68%的选民表示，他们仅能勉强维持生计，或仍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而他们子女的生活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甚至更差。总统大选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调查表明，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更糟糕的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甚至没有人能帮助我们。”

选举结果不仅表明美国民众对美国经济的不满，也说明2007年美国经济发展遭遇了一系列的阻碍与挫折。2007年年初，因非法贷款给学生事件被揭发而把美国私人贷款公司推到风口浪尖上。这一丑闻说明为数众多的大学生负债累累，而这些学生的家长必须在知识经济中学会自立。随后，人口调查局称：2006年没有医疗

保险的美国公民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从 2005 年的 4480 万人增长到 2006 年的 4700 万人，其中新增加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随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雄心勃勃地表明要扩大医疗保险的受益面（几乎所有候选人所提到的医疗保险都是本书中将提到的政府可承担的、优质的医疗保险）。因此，改革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注定成为 2008 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

然而，最糟糕的发展状况（对于许多时事评论员来说，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由于次级房贷所造成的金融市场的不健康发展——银行或贷款机构给那些信誉缺失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提供的贷款，致使大部分人因无力偿还银行的高利息而负债累累，甚至破产。2006 年年末，200 多万次级贷款人失去了住房，无法偿还的债务累计达到 164 亿美元。

事实上，次贷危机给美国人造成的痛苦和烦恼，仅仅是冰山一角。对于许多家庭来讲，房产已经变成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保障，倾注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和渴望，更是他们寻求美国梦的唯一财富。然而，这种经济安全是建立在贷款上的。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贷款买房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是建立在对房价不断上涨的推测和较低的借贷信用之上的。2006 年，由于美国的住房市场低迷，房价也开始走低，信用市场开始衰落，房产止赎率急剧攀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到事态将会如何发展，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美国的国家安全网已经土崩瓦解，新的社会契约论又出现了。因此，到了该解决经济危机的时候了。智囊团、基金会和主要的政治家将迎接这次挑战，新的政策报告也开始出现在华盛顿和各州政府。对医疗保险和经济安全的民意调查顷刻间风靡一时。显而易见，美国人是多么关心这些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话题。在国会，民主党人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下设的人力资源小组委员会更名为收入保障和家庭援助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Income Security and Family Support）。2007 年以

前，我在攻读法律专业的学士学位时，曾作为实习生走访过国会委员会。而在 2007 年年初经济剧变发生后，国会委员会主席曾 3 次邀请我对中产阶级经济安全性提供证据并出谋划策。

上述举措已经引起专业分析家们对经济稳定的关注，而过去他们对这个有争议的话题并不关注。美国国内顶尖级的思想家也开始关注一系列至关重要但曾被忽视的问题，其中包括不断发展的公共服务中工作稳定的效应、公众抵制全球贸易扩张的原因以及保障美国贫困家庭收入的福利体制改革，并提交了新的经济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本书也是如此，在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和非常规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展开大量的相关分析，试图从多个角度深入考察收入不稳定的原因，向广大读者展示收入不稳定研究中所呈现的明显利益波动。

在这些新的研究基础上，本书得出的中心结论是美国家庭收入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修订本书时，我和耶鲁大学一些出类拔萃的学者继续进行早期关于美国家庭收入不稳定的研究工作。2002 年，精装版的数据已经收集完毕。这个版本收录了 2004 年以来所有有关美国家庭收入不稳定的资料，并且根据最新的研究重新整理了部分此前的研究成果。修订版添加了所有关于经济不稳定的最新研究数据，还简要对比了我与其他学者的最新分析，其中大部分内容与精装版相似。这部新的著作不仅包含有关收入不稳定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包括关于经济安全的各种观点和看法，清晰地揭示了美国经济危机波及的民众人数以及人们遭受经济危机的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不稳定并不是少数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大部分美国人即将应对的难题。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由于收入不断减少，曾经折磨美国穷人的经济问题（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障、工作不稳定、债务缠身、经济破产、房产被银行扣押等等），逐渐开始侵袭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没有贫穷到可以享受公共医疗，但也没有富裕到可以独立承担巨额的医疗支出；他们没有贫穷到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Social Security) 的地步，但也无法享受 65 岁退休后舒适的生活，甚至中产阶级的上层也同样处于不稳定的境地，他们的技术优势变得越来越脆弱，脑力劳动也不能像期待的那样带给他们稳定的生活。

然而，这些遭遇危机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独自面对成功与失败：必须支付教育费用、偿还住房贷款、确保医疗保险、存储足够的养老金以备不时之需、学会自我保护 [2005 年破产改革法案 (Bankruptcy Reform Bill) 公布后，他们不再享受传统的破产救济]。与此同时，在“所有制社会” (Ownership Society) 的标签下，乔治·布什总统和他的支持者要求美国人用新的个人退休账户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来取代有保障的社会养老保险和个人“医疗储蓄账户” (Health Savings Accounts)。这种高额的医疗计划要求人们从个人账户取出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他们的医疗保障，并以此取代医疗照顾 (Medicare) 和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 (Workplace Health Insurance)。难怪如此众多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并不是为他们着想，如此众多的美国人充满焦虑地望着不断摇摇欲坠的扶梯，而不是充满信心地眺望扶梯的最高处。

如今，美国中产阶级在为其生活担忧的同时，还要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这并非易事。他们将会更强烈地反对移民或者自由贸易，要求政府制定更多的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危机的政策，而不只是对美国未来政治进行高谈阔论；希望领导者和公众能够预见新时代的经济危机并引起重视；要求改革并扩张医疗保险的范围，改善退休福利，并资助中下等阶层的民众；要求提供能够抵御灾难性经济危机的保险和福利，以应对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巨额的家庭开销以及较低的工资待遇。为了满足人们的愿望，首先必须意识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机会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需要彼此之间密切配合。正如，投资商和生意人需要基本的经济保护才能吸引他们涉足有经济风险的领域，因此普通劳动者及其家人也需要以家庭经济的稳定为基本保障，这样他们才有信心投资未来，抓住风险机会。

经济不稳定影响到美国各个阶层的生活，并引发一系列讨论，其内容不再围绕着富有的美国人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贫穷美国人的生活。亚丽克西斯·托克维尔对美国人热衷于“正确理解自身利益”感到惊奇，这种个人主义的哲学理念主张援助他人，分担痛苦。正确理解自身利益意味着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不是因为它仅对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造成伤害和痛苦，而是因为它几乎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磨难。他的思想与吉姆·韦博参议员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吉姆于2006年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并于2007年1月在布什总统国情咨文演说中代表民主党派回答总统的提问：“我们认为评价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准与华尔街的数据无关，而与居民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也与2007年一位发邮件给我的女士观点完全吻合，“我已经厌倦为金钱而工作的生活了，我希望金钱为我服务”。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金钱为所有人服务，为本书中谈到的面对衰退的经济仍然努力工作、数以百万有着相似经历的美国人服务，他们的精神正重新塑造当今的公众舆论。如今，人们对经济的担忧愈加深重，就如同不能掌控的命运、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无法阻挡的势力所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样。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性地思考，果断行事，那么为我们服务的经济将指日可待。实现经济保障也不是白日梦，而是真正的美国梦。

初版序言

《风险大转移》讲述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完全理解这其中的缘故。原因之所以如此难以捉摸是因为：它完全有悖于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表面繁荣；它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退休生活以及我们的医疗保险。且问题涉及的不只是一个方面：为什么现在失业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从前？为什么我们开始不断地为退休后的生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什么医疗储蓄账户是我们拥有医疗保险的唯一途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时，我们没有共同的言语、缺少可靠的指标将这些支离破碎的想法连接起来，因此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如此的不安全。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希望通过列举一些新的数据来解释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并向读者展示政府和企业是如何将经济风险的重负转嫁到不堪一击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身上的。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我将其称为“风险大转移”，它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以及各政治派别。“风险大转移”将工作的不稳定、家庭面临的压力，退休生活的变化无常和美国医疗保险的不均衡联系起来，已成为美国国内两党政治争论的焦点。

“风险大转移”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变，也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多年来，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怀着对经济稳定的承诺和对经济机会的信任，为从未实现过的美国梦而不懈奋斗着。鼓励这种观点就是深信经济的稳定是维持经济强大和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当灾难来临